

河洛
春秋

河洛姓氏源流

□记者 孙钦良



“岁寒三友”松、竹、梅，“春风一家”桃、李、杏，都是姓，并且都颇具诗意。

岁寒三友与春风一家

“岁寒三友”指的是松、竹、梅，“春风一家”说的是桃、李、杏——松、竹、梅、桃、李、杏都是姓，这是一组颇具诗意的姓氏。

梅姓在我市偃师山化乡有聚居地。该乡王瑶寨沟村有梅姓近百户五六百人，是我市梅姓居住最集中的村。另外，山化乡牙庄村有梅姓近10户40多人，翟镇翟东村也有梅姓约80人。偃师梅姓注重修家谱，当初由山西迁豫，即初拟《梅氏家训序》，五言六句，读来上口，属于宗族家训。梅姓意象很好，有画面感，含清芬意，正所谓一枝梅花踏雪来，寒风中独自开，疏影横斜，一片冰心，高洁也在其中了。

梅姓人口较多，目前全国约有130万人。梅姓得姓于梅伯，有两种说法。一说为商汤后裔。商汤的太子太丁封其弟于梅（今安徽亳州东南），为伯爵，世称梅伯，其子孙以梅为姓。一说商朝末年有梅伯，是纣王的卿士。他为人正直，见纣王无道，屡次进谏，有人劝他：“莫再进谏，以免招祸！”他慷慨陈词：“武将战死，文官谏死，如果都不敢直言，朝廷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？”后来，纣王恼怒梅伯，把他杀了。周武王敬重梅伯，将其后裔封于湖北黄梅，其子孙遂以祖先封邑为氏，称梅姓。梅姓还有几个来源，略去不述。

梅姓名人较多，最有名的是梅贻琦、梅兰芳。前者1931年起任清华学校校长，后者为著名京剧大师、梅派艺术创始人。

松姓最初分布在山东省沂水县一带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和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记载：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带着大臣到泰山祭天，下山途中突遇大雨，正好山上有5棵大松树，枝叶繁密，可以挡雨。秦始皇认为松树护驾有功，赏其为“五大夫松”。此后，有居于“五大夫松”下者，以松为姓，世代相传。另外，也有公姓改为松姓的。《洛阳市志》第二卷第629页显示我市有松姓。

竹姓与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有关。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、叔齐善良且谦逊，长大后，他们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，谁也不肯就任，于是一同逃离孤竹国，来到洛阳偃师与孟津交界处。恰逢武王伐纣，他们认为这是以暴除暴，不可取，遂上前阻拦，却没能拦住。武王灭商后，建立周朝，两人很生气，耻于食周粟，饿死在首阳山。有人佩服二人品德，遂在“孤竹国”3字中摘取竹字为姓，称竹氏。偃师、孟津有竹姓。

竹姓还有其他来源。《后汉书》与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有女子浣于水，忽见三节竹子流至两足间，她拾起竹子剖开，得一男孩，遂养育成人。这男孩长大后很有才，自立为夜郎侯，以竹为姓，其子孙都姓竹。

关于桃姓的起源，通常的说法是出自春秋时燕国高士左伯桃，其后裔中有姓桃的。桃姓在浙江、江西分布较多，但总体上人口很少，历史名人也很少，倒是起名很方便，比如女孩姓桃，取名叫花，就是桃花了，也很有趣。《洛阳市志》第二卷第629页显示我市有桃姓，但具体聚居地不详，文献资料也很少。

李姓是大姓，目前有9200多万人，我省又是中国李姓的第一大省，是该好好介绍一下。最近有李姓读者打电话问：“为什么还不写李姓？”其实早已写过了，详见2008年2月29日《洛阳晚报》，此不赘述。

杏姓起源较早，出自齐国大夫的采邑，采邑的名字中有杏字，其子孙遂以杏为姓。杏姓人口极少，有人认为该姓与杏花村有关，说杏花村可能是杏姓聚居地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倒是山西省长子县有杏姓族人60余口。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时，我市未发现有杏姓，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没有杏姓迁居我市，还不一定。希望有发现此姓的朋友来电告知，以丰富我市的姓氏元素。

中国人对“岁寒三友”怀有特殊感情：坚韧不拔的青松、挺拔多姿的翠竹、傲雪报春的冬梅都有不畏风霜之品格，令人敬慕。但从这三姓的得姓来源看，并非出自图腾崇拜，倒是一个意外。

“春风一家”也很好：让桃、李、杏共入春天之怀抱。这三姓放在一起，大有春色一族之感，十分清新烂漫。



西安事变爆发

时，张学良安插在洛阳的炮旅旅长叛变，不控制机场和铁路，致使中央军迅速逼向西安，打乱了事变计划。

□记者 孙钦良



1936年12月4日，蒋介石带着一班军政大员从洛阳来到西安，再次督促张学良、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。张学良劝蒋抗日不成，遂于12日5时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，到临潼华清池捉蒋。蒋从卧室窗户跳出，上山躲藏时被捉，杨虎城的17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、蒋鼎文、陈调元、卫立煌、朱绍良等军政要员，西安事变爆发。

西安事变最早牵住了两座城市的神经：一是洛阳，二是南京。对张学良来说，南京对他是政治上的压力，洛阳对他是军事上的压力。洛阳离西安太近，张的军队在洛阳只有两个炮团，而洛阳军分校的4000多人和洛阳以东陇海线上的大批中央军，随时可能进攻西安。张的当务之急，是要让洛阳的黄永安炮旅迅速控制机场和铁路，阻断中央军西进。

现在，要看张学良安插在洛阳的黄永安这个棋子发挥了作用了。12日5时，洛阳这边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就是黄永安，他接到了张学良的密电，内容是：第一，通知洛阳军分校军士教导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云飞（东北籍），带人迅速封锁飞机场、军械库，不可使一架飞机起飞。第二，控制陇海铁路交通运输线，阻止中央军西进。第三，封闭一切电台及洛阳各家银行，以策应西安的兵谏行动。

黄永安接电后，先是恐惧，后是犹豫。他权衡利弊后，决定叛变投蒋，遂携密电急赴洛阳军分校，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。

祝绍周一看到密电，大为惊恐，拔出手枪逼问黄永安：“你意如何？”黄永安答：“我不听乱令。”意思是说他不会听张学良的命令。祝绍周仍不放心，问：“你是真心？”黄答：“我心向蒋委员长，怎能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？”祝大喜，说：“君贡献党国，党国决不负君！”

于是，两人分头行动。黄永安回部队稳住炮旅。祝绍周迅速调动军队拘押赵云飞，又调动洛阳军分校两个军官总队的学员2400余人和警卫连300余人，包围了尚未起床的东北军学员、学员1000余人，并在黄永安的帮助下，占领洛阳火车站及龙门、邙山等军事要地，控制了西工飞机场。他还面约陇海铁路运输司令钱宗泽，要其集中潼关以东的列车，准备西运中央军，同时急令正在豫西构筑国防工事的46军停止作业，迅速抢占潼关。

祝绍周不愧是老蒋的同乡，他做的这一切对蒋很“给力”。黄永安这边却不太顺利，虽然他是旅长，但属下两个炮团都是东北军。12日晚饭前，他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，严肃地说：“接西安来电，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，这是叛逆行动，我们不能服从。”第一营营长齐长生质问：“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，我们打不打？”黄答：“打！”徐德庸团长说：“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的，打西安对不起张副司令。”说完就哭了。叶筱泉团长只是拭泪，没有发言。黄永安说：“在此生死攸关时刻，我们要权衡利害轻重。我们携家眷在洛阳，周围全是中央军，若被包围，怎能突围？大家不要妄动，我负责你等全家安全，不会让大家吃亏！”

开完会，几位营长走出来，一个说：“真不忍心背叛张副司令，明天请假不干啦！”另一个劝道：“看看情况再说，我不会坐以待毙！”黄永安不放心，次日即将团长徐德庸、第一营营长齐长生、第三营营长李春生撤职。

黄永安叛变投蒋，对事变影响很大，在军事上，使西安东北军未能控制战略要地洛阳，潼关被中央军28师占领，西安东侧防线等于向中央军洞开。张学良与徐州所部的联动被洛阳这座他不能掌控的城市完全切断，南京方面却能利用洛阳这个中间站，四面联络和沟通。

事变后，祝绍周立即电告南京方面的何应钦：“西安发生事变，真相不明；蒋委员长在临潼，具体情况尚不明了。”身兼巩洛警备司令、人称“豫西王”的祝绍周忙得不亦乐乎，成为所谓“挽狂澜于既倒”的关键人物。目睹祝绍周之表现，在洛阳的南京代表向上面汇报：“祝坐镇洛阳，宵旰勤劳，勇于负责，甚是钦佩！”建议中央出面予以慰勉。

当时，面对老蒋的被捉，南京方面有人主战，有人主和。何应钦要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，甚至提出用飞机轰炸西安。宋美龄质问：“若用飞机轰炸，误伤委员长咋办？”她主张用谈判解决问题，并痛斥主战派居心叵测，想逼急张学良，给老蒋带来性命之忧。祝绍周综合“和”、“战”两派意见，主张“刚柔并用，政府申讨与家族谈判同时进行，以营救委座出险为最高原则”。这个意见首先得到宋美龄的肯定。

但此人也真是书生意气（祝爱读诗书，书法十分了得），12月22日，宋美龄、宋子文等人由南京经洛阳前往西安谈

西安事变时的洛阳

河洛春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（四十八）

判，他竟别出心裁，写了一个便函，劝宋美龄“留陕为质，使领袖早日出险，并准备以身殉国，流芳千古”，身边人赶紧劝道：“万万不可！哪有让东北军再扣下蒋夫人的道理？”他犹豫再三，才没把这个建议送给宋美龄。

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密电发至洛阳，祝绍周只用一天多时间就完全控制了洛阳局势，使形势向着有利于老蒋的方向转变。但祝绍周还是不放心，他不断地向黄永安施加压力，直至解除东北军炮旅的全部武装。那么，接下来，南京方面怎样利用洛阳的军事力量和张学良讨价还价，洛阳飞机场为营救老蒋出了哪些力，祝绍周、黄永安的下场又如何？请看下篇。

